

抗战中后期,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。人才选拔道路壅塞,各级机关人浮于事,大小官员竞相聚敛。缺乏鼓励人才发展、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,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国民党依据孙中山制定的军政、训政、宪政三程序,长期实施训政,即以党治国,国民党一党独大,各种监督机构形同虚设。

国民党为何在抗战后期彻底贪腐?

贪腐大案层出不穷

官员提升名义上通过组织层层选拔,但由于不具备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,实际完全以上级的一己好恶为标准。当时,国民党内部一份有关山东党务政务概括的报告,生动刻画了山东地方高级官员的种种丑恶形象,实际也是整个国民政府统治区官场的真实写照:

“缺乏领导能力又无真实信仰,对于下级早已失去领导作用;对县党部负责人之委派,多以是否拥护其个人,是否自己亲近为标准,不以是否有领导全县之能力与信仰为标准。甚或对于有能力有信仰之县党部书记长加以嫉视,无故撤换。对于转发下级党之经费,多不按时转发,或藉此以谋私利,或供其个人挥霍之需。”

贪污是国民政府吏治腐败最明显的见证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,政府内的贪污腐化现象即十分猖獗,据1939年军统重庆特区报告,他们秘密查获的贪污不法人员包括交通部长张嘉、重庆卫戍司令刘峙、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缙绪、第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。抗战中后期,各级权力机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,从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员到地方的保甲长,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、中饱私囊、挥霍浪费行为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先后发生了几起公布出来的大案,如黄金提价泄密案、高秉坊案等,虽然这些案件不一定是当时真正最严重的,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黄金案:1943年11月,国民政府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,以向美购买的500多万两黄金作基础,实施出售黄金,收回法币政策,回笼货币,吸收游资。由于通胀愈演愈烈,出现挤兑黄金现象,国民政府不堪重负,财政部在不断提高金价基础上,又于1945年3月决定大幅提高黄金比价。但决定还未公布即遭泄露,一些人乘

机在调价前一日大肆抢购黄金,短短几小时,政府差价损失即达几千万元。事发后,蒋介石当然在日记中表示:“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”,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处理了少数有关人员,大部分责任者都被层层庇护,逍遥法外。

高秉坊案:高事发前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,他长期挪用税款,囤购物资。1945年2月,又擅将公款700余万元存入银行。“该署经办税款保证金,竟无确实收入账目可稽,开征已四年亦从未清查。”在孔祥熙渐告失势后,高案被揭露。初被判处死刑,后复判改为无期徒刑。

“开明专制”代替法制

制度建设欠缺,行政效率低下,各级机关人浮于事是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。蒋介石虽然为行政制度化程序化作了一定努力,但他事必躬亲、独揽权力的做法首先动摇了国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础。蒋一人身兼国民党总裁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、行政院长、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、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、中交农交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任、中央设计局总裁等多项重要职务,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,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被破坏。

但开明专制对统治者素质的要求其实是极高的。且不说蒋的统治基础、知识背景和性格修养能否达到开明专制的要求,仅就其政治能力言,就让人怀疑。如在人为造成的冗繁事务中,蒋经常弄到糊涂的地步。冯玉祥日记中记载,他早就送交蒋的报告,却被蒋催问,当冯告知实情时,蒋“屡说对不起,复问余之督练十条。余亦答以今早即送来,蒋先生亦未收到,更为难过”。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。

基层组织的状况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腐败。虽然推行保甲、实行新县

制,国民政府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并不严密。基层社会及政权的控制权仍牢牢把握在一些传统士绅及权贵手中。不受约束的权力不断膨胀,其向百姓的需索是无底线的。

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结构的不合理,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。权势阶层可以凭借权力牟取暴利、挥霍享受、欺压百姓,而普通百姓的权利却难以保障。普通百姓遭受权力机关及权贵、军警欺压、凌辱、讹诈、殴打、杀害的事件时有发生,人民财产被强行征用、非法没收甚至被权贵占为己有的现象也多有发生。重庆发生特务公然枪杀工人胡世合的恶性案件,引起工人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峙,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。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十二中全会宣言承认:“各地人民不免有因各种服务人员之玩忽职务,而受意外之损害者,或因逾越职权之措施,而遭法外之苛扰者。”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,30多名不含政治色彩的代表联名提出要求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提案,特别强调如下几点:

人民应纳粮额,应照法定手续交纳。如有不法抑勒敲剥被害人得向法院告诉。

保甲经费应由政府规定统收统支,不得由乡保自行征敛。

政府如有特别必要,向人民派款或购粮,须由中央按照国家总动员法确定拟派标准,配赋各县市。由各县市组织配额分摊委员会按照各户田亩及财力,公平分摊。不得由地方官及承办人员任意指名勒派,上下其手。

由政府严令军队,不得直接向人民征取马干给养,尤其不得派款购粮。

这些,本为政府行政和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,但当时社会远远无法做到,参政员们的要求,毋宁说还是一种奢望。(据人民网)

蒋介石编造“正统史观” 黄兴遭贬



孙文(孙中山)与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领袖,革命党人往往将其并称。然而,1927年南京政府开张后,“孙黄并称”被“孙陈(其美)并称”所取代,黄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。

黄兴的历史地位被人为地贬低,主要缘于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黄兴与孙文、陈其美的争论。1913年3月20日,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杀。在如何应对宋案的问题上,黄兴与孙文产生严重分歧。黄兴主张按照法律程序解决,孙文则认为“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”。国民党后发动“二次革命”但迅速失败。孙文在总结败因时,主要强调革命党人不服从、不统一,并着重追究了黄兴的错误和责任。

在是否重新组党的问题上,孙、黄意见也截然相反。孙文主张解散国民党,重组中华革命党。黄兴则反对组织新党,主张沿用国民党的名号加以整顿。两人各执一词,各自的拥护者矛盾也越来越大。激进派陈其美毫无保留地站到了孙文一边,对不赞成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志大肆攻击。同盟会的大多数军事骨干则深为黄兴抱不平,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,并成立了奉黄兴为精神领袖的“欧事研究会”。顾全大局的黄兴选择了远走。1916年黄兴在上海去世,陈其美同一年也被袁世凯指使的刺客暗杀。

1927年,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不久后主持了陈其美殉难11周年紀念会,他如此解说国民党党史:“我们国民党是中华革命党解生出来的。中华革命党是总理(孙中山)创造的,总理的创造中华革命党,也得陈英士许多助力来的。所以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的成功,我们第一纪念总理,第二是要纪念陈烈士(即陈其美)……”蒋介石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了“孙文—陈其美—蒋介石”的国民党正统史观。此后,黄兴被降为一等的“革命先进”。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张自忠死于沸腾的舆论

上世纪30年代中期,国民政府与日本经过艰苦的谈判,达成协议,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,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,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。那个时候,蒋介石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,“忍辱负重”,不主动打仗,于是他便被当时的老百姓骂为“华北头号汉奸”。这种时候,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,张自忠曾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,令大刀队夜袭敌营,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,而后才有了《大刀进行曲》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。

1938年,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,他虽然接连取得了“鄂北大捷”、“襄东大捷”,但他没有死,所以老百姓和记者都已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,但这些胜仗,不过是在弥补他做过汉奸的罪过。

1940年,日军集中30万兵力,猛攻湖北襄樊。张自忠平素生活简朴,从来只穿土布军装,与下级军官无异,但这一次出征,将军一反常态,竟穿上了黄呢军装。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,他们后来才明白,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。

5月14日,张自忠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切断,日军兵力是自己的1倍半,但张自忠毫不畏惧,屡次下令冲锋。日军屡屡受挫,奇怪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倔强,获悉是张自忠亲自带队,15日便大举增兵,以1万兵力,分南北两路,夹击包围张自忠。

5月16日,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,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,弹如雨下,革命军阵变成一片火海。张自忠身材

高大,穿着耀眼的黄呢军装,目标明显,日军更是从3个方向,用交叉火力,向他那里射击。中午,张将军左臂中弹,但他坚持着,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。他告诉副官:“我力战而死,自问对国家,对民族可告无愧。”

此时,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,但谁都可以突围,惟张自忠是没有权力撤退的,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,于是,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。

下午3点,张自忠腰部中弹,右肩右腿被炸伤,只能卧地指挥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将军又中3弹,却猛然站起,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,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,将枪托击碎他的头颅,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……(据《老年生活报》)